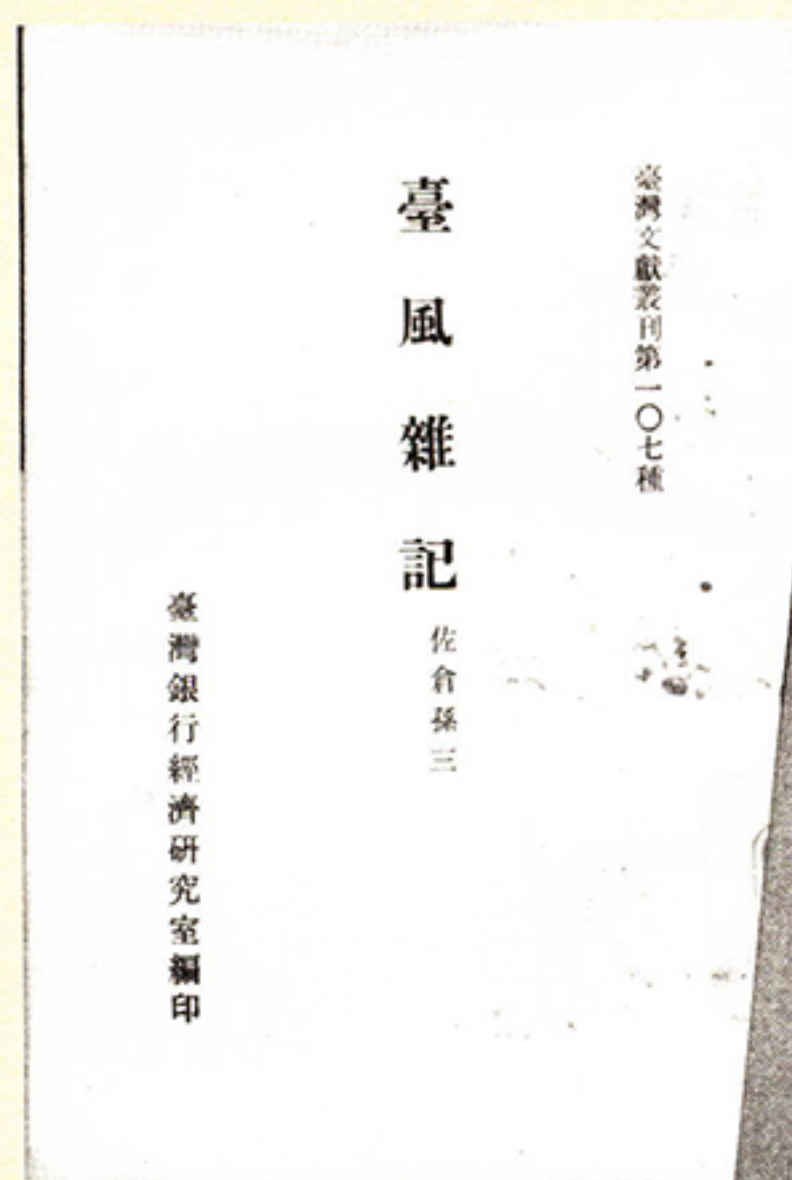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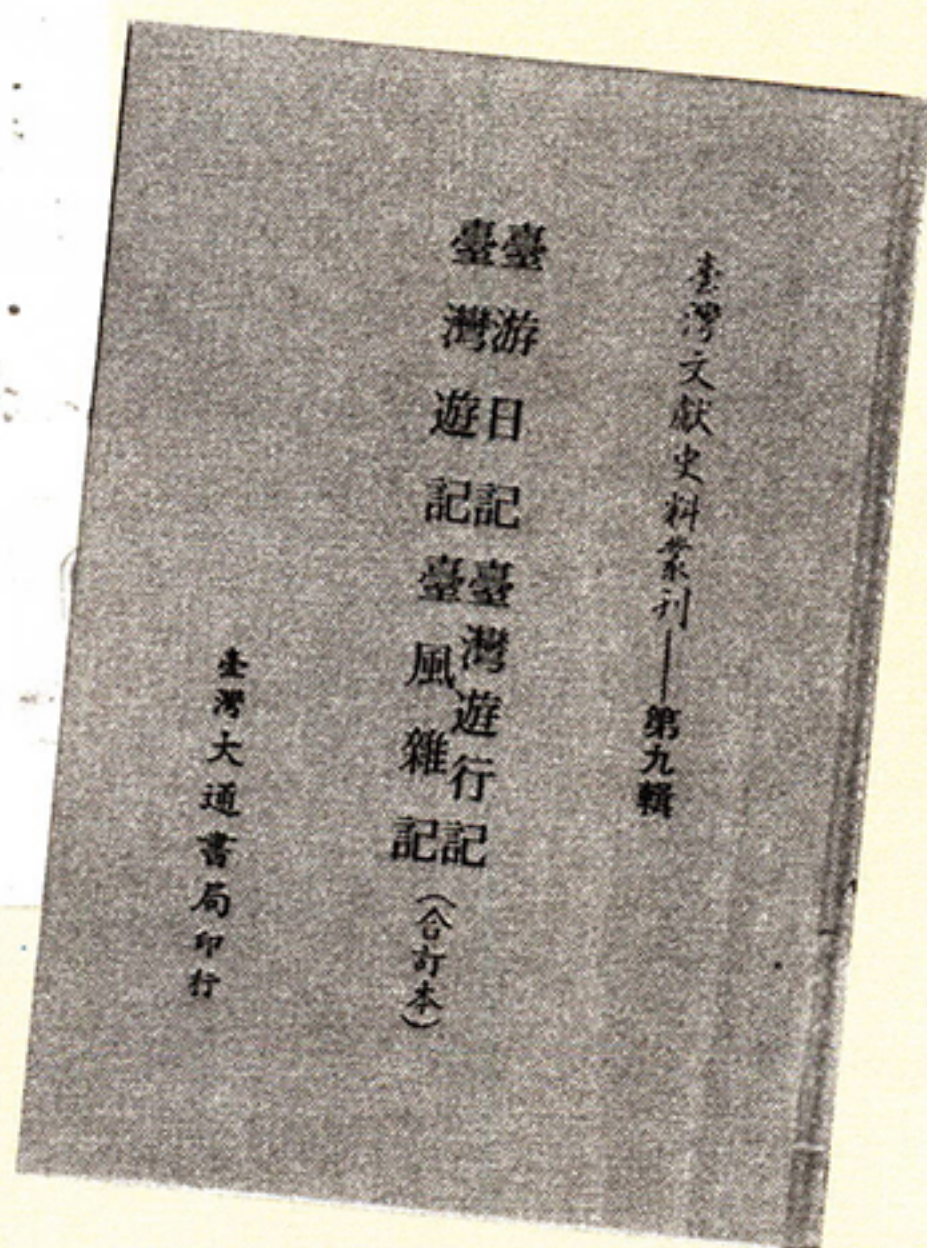


殖民者 對殖民地的風俗記錄 ——佐倉孫三所著《臺風雜記》之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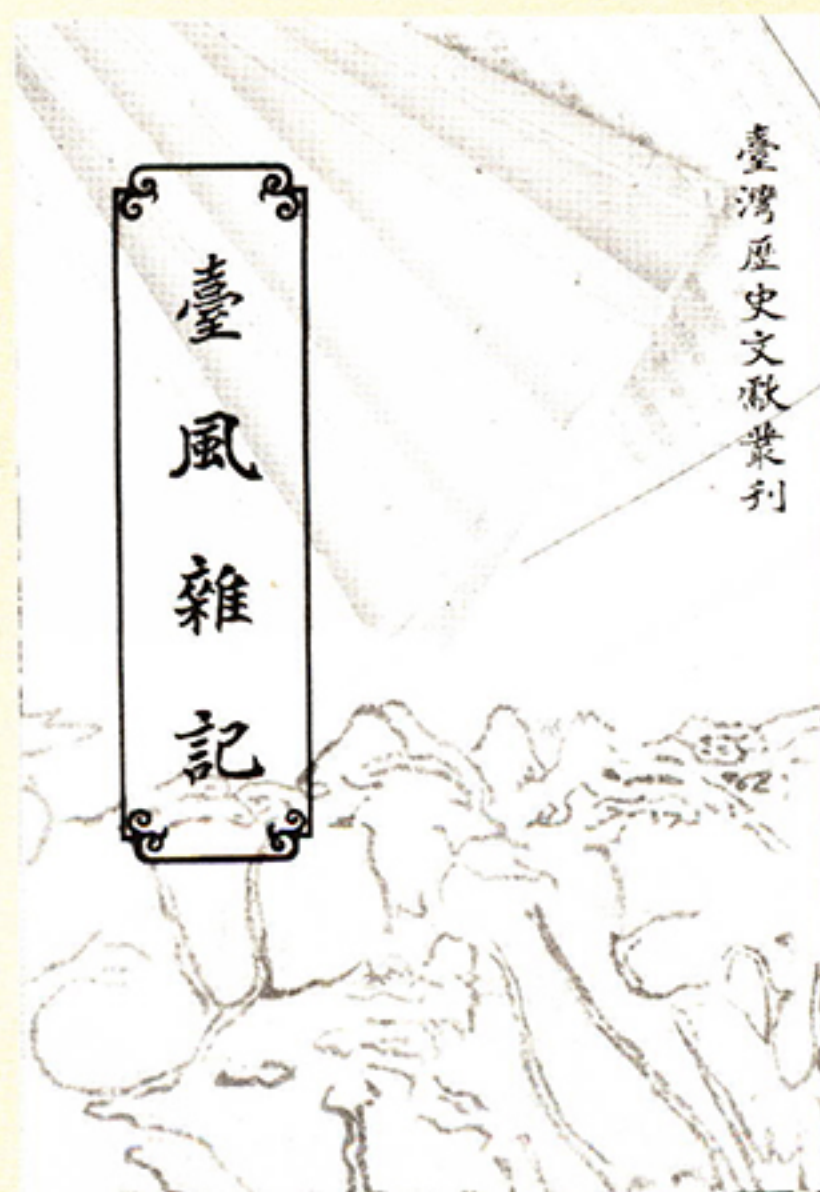
林美容*



1961臺灣銀行版



1987大通書局版



1996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據臺灣銀行復刻版

The First Record of Taiwanese Folklore by an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Official: Tai-fong-tza-chi

Lin Mei-rong

Abstract:

In 1903, a high police official published a book called Tai-fong-tza-chi (臺風雜記) which has included 110 essays concerning with Taiwanese folkways. This is the first book on Taiwanese folklore reported by a Japanese government official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Taiwan. The author is Magozo Sakura who came to Taiwan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Japanese occupation in 1895. He stayed in Taiwan for three years while he worked for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He wrote these essays when he traveled here and there in Taiwan for the need of his work. He not only wrote about what he had seen, heard, and experienced, but also what he had thought about the exotic ways of living in Taiwan. More importantly, he made comparison with his own Japanes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and sometime made suggestions to the government authority for the purpose of colonization in Taiwan.

Since this book was written in classic Chinese, we could see that the aimed audience includes not only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officials who were usually Intellectuals and might had studied classic Chinese as well, but also Taiwanese people who can read classic Chinese at that time. These 110 essays, each following with some short commentary remarks written by Mr. Sakura's friends, three Japanese and one local Taiwanese, provided lots of information about Japanese traditions and customs as contrasted items to Taiwanese ones of major description. The purpose, the attitude, the style, and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Mr. Sakura's writing will be analyz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 very early Japanese colonization in Taiwan at the tur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t was not simply the encounter of two cultures. It was a delicate claim of new territory of their colony.

Key words:

Japanese colonialism, Taiwan folklore, cultural encounter, comparative folklore, colonizer's documents

一、關於《臺風雜記》及其作者佐倉孫三與構作群

1997年8月我的朋友祖運輝教授從日本京都寄了《臺風雜記》的影本給我，我記得1992年我在東京一年的時候見過此書，彷彿自己也影印了一份，但是卻不見了，因此很高興又有這份影本。這本書就這麼一直在我心上，不僅是出於對台灣民俗專業的研究興趣，也是出於對久遠年代的一種懷想。

這本書在1903年由東京國光社出版，作者佐倉孫三（Sakura Magozo），書前有作者的長官後藤新平作序，作者的漢文老師三島毅（即三島中洲）題詩，書後有作者的朋友橋本武寫跋。全書共一百十頁，正文共一百十條，最後一條「生蕃」還有附尾四條，因此總共有114條。每條均有條目。每條之後均有「評曰」，有些評曰之後，還加上「又曰」，是作者佐倉孫三的朋友橋本矯堂（即橋本武）、細田劔堂、山田濟齋及一位在台灣新報的台灣人記者（作者未提其名）所寫的，針對作者正文所述的內容予以評論。不過，哪一條「評曰」是何人所寫，完全看不出來，最初還以為評曰是作者所寫，及至看到書後最後兩行作者的按語，才知道是上述幾位作者的友人諸君所寫。寫評語的這四個人應該都是作者在台灣的朋友。以橋本武為例，他在跋中說：「亦久在此地，從事育英」，可見他是在台灣教書的日本人。而山田濟齋則與佐倉孫三是同門師兄弟，同樣受業於三島毅門下。因此，《臺風雜記》雖是佐倉孫三所作，但是共同構作此書的還有後藤新平、三島毅、橋本矯堂、細田劔堂、山田濟齋等人，主要都是日本人，可能作者佐倉孫三也有意凸顯此點，故隱去評論者之一的某台籍人士之名。

作者佐倉孫三，號達山，福島縣二本松人士，生於1861年，歿於1941年（昭和16年），享年81歲。是大審院檢事佐倉強哉的弟弟，1868年就讀二松學

* 林美容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

舍。歷任靜岡警察署長、山梨縣南都留郡長。曾赴中國福建擔任中學堂及福建省警察學堂之教官八年之久¹。回日之後，擔任早稻田大學講師及二松學舍塾頭，培育學生甚多。明治與大正時期，他是活躍的中國問題評論家，擅書道及劍道²。

明治28年（1895）5月，佐倉34歲時，就到台灣，橋本武的跋中說佐倉先生「先眾赴臺」。他在晚年自述，他原本在東京府任職，台灣割讓之後，樺山海軍大將以戰勝之榮而成為總督，水野眾議院書記官長為民政局長官，水野的兩個門生來勸佐倉一起去台灣，他因此辭職，準備行裝並受命募集各種洗衣匠、髮匠、裁縫師、木工、掘井者等共一百八十多人，並進行體格檢查，部署之後，由南京出發，航向廣東，陸續有老輩武者加入，從滿州回航的支那通譯連亦加入，佐倉得與文武百官陪同樺山總督乘坐橫濱丸於5月24日自宇品港出發，27日到琉球中城灣，與進衛師團相會。28日到淡水港外，因聽說有上陸危險，一直在三貂角與澳底灣的中間轉來轉去，直至6月1日清國代表李經芳乘船來會見樺山總督，方得交換領台的公文書³可見他是第一批赴台的官員。他到台灣來時，年齡可能已經不小，最後一則「生蕃」的評曰中，評者說佐倉先生「雖中年奔走仕途，未曾廢筆硯」，可知他是中年的時候才到台灣來做官。佐倉最初為學務部員，後轉任警保課高等警務掛長，至明治31年（1898）升為鳳山縣打狗警視⁴，也擔任過台南辨務署長，他自述在台的警務工作，有時是草擬告諭新附之民的告諭文，有時要到土匪窩探勘，以除民

1 不過根據他自己在〈三十七年前の夢〉一文之自述，他說在台三年之後，到對岸的福州任職六年（P.135），而不是《二本松市史第九卷》所說的八年。以上資料都是日本友人西村一之所提供。

2 《二本松市史第九卷》，頁65。不過這一則記載完全未提及他在台灣的事跡。

3 佐倉孫三，1932，〈三十七年前の夢〉，日本合同通信社編，《台灣大觀》頁157，1985台北成文出版社復刻。

4 參見台灣新報第414號（明治31年1月30日）。

害，常臨危地，不知幾回⁵。從書中內容看來，佐倉足跡遍及台北（景美、大稻埕）、宜蘭（羅東）、澎湖、安平、高雄等地。他擔任總督府民政局官員，公務之餘完成此書，目的是為了作為施政之參考。從全書的最後一則「生蕃」，他自述「留台僅三歲」、「終則遭喪糟糠之妻」、「今去其時既六星霜」，可見他在台灣任職只有三年，留台期間連他的妻子也死了，他寫此則是距離他到羅東巡視民家及生蕃時，已有六年。又說「其間執筆記事者，僅有此篇」，應該是說各篇文稿都是在台灣任職時寫的，只有「生蕃」一則是六年之後才寫的。那時他是在日本準備此書之出版與發行，或是在福建任職，則未可知。

佐倉先生精通漢文，他的漢文老師是三島中洲，我現在無法知道他學習漢文的過程，但是當時的知識份子似乎多習漢文。佐倉先生可能在當中算是飽學的，這本《臺風雜記》代表他漢文的造詣。他善用漢文典故，例如「蓄財」一則，說台灣人「惜陰之風，不待陶侃之言」，他也精通古籍，如「蓄財」一則，引《論語》：「禮，與其奢也，寧儉」。

本書除了最後一則，其他都是作者於1895-1898年在台灣三年之間所寫的。部分原作曾在明治29年（1896）12月5日，以「稱史」之筆名在台灣新報第78號發表，刊出了纏足、鴉煙、不潔、愛爪、娶妻、葬典、婦女修飾，這幾則應是他最初所寫的稿件，初刊時並未附評曰。初稿與後來印書的文稿稍有差異，如「葬典」一則初刊稿最後一句是：「是全虛禮非真情也、與聖訓無相反歟」，1903年的國光版定稿則是「全屬虛禮，可笑也」，簡潔多了。

除了《台風雜記》，佐倉孫三還著有《日本尚武論》（1892，日本教育社出版）及《武士かたぎ》（1926年，日東之華社出版），並編有《日岡鉄舟

5 佐倉孫三，1932，〈三十七年前の夢〉，日本合同通信社編，《台灣大觀》頁159，1985台北成文出版社復刻。

殖民者對殖民地的風俗記錄——佐倉孫三所著《臺風雜記》之探討

傳》（1893，普及社出版），其著作並在1937年，由達山會出版《達山文稿》。在1932年出版的《台灣大觀》一書中，他寫了一篇〈三十七年前の夢〉敘述他在1895年承台灣總督府民政局長官水野之門下吹野等人之鼓吹至台赴任過程，他不僅協助在日募集赴台人員，而且與首任總督樺山同乘橫濱丸赴台。

為作者寫序的後藤新平，1895年就受聘擔任台灣總督府衛生顧問，1898年3月擔任總督府民政長官，在台期間共8年8個月，是台灣現代化建設的推動者。他的序文中說：「聞君曾奉職茲土」，顯示後藤寫序時，佐倉先生並不在台灣，似乎他也不曾是後藤的屬下，所以後藤用聽說他曾在台灣任職的語氣。

至於書前所附的三島中洲的詩共有七言絕句八首，是他在1895年8月中所寫，寄給佐倉先生的詩，主要是對當時台灣所見所聞的感懷。其中有一首「四處戰爭流血腥，頑民抗敵戶皆扃，天然村落好城堡，篁竹森森遶宅青」，還被本書的評者引用到「竹籬」一則中。

三島毅，生於1830年，卒於1915年，日本備中國窪屋村中島村出生，漢學家，與重野成齋、川田甕江並稱明治三大文宗，明治十年（1877）罷官，在東京開設家塾。稱二松學社，與慶應義塾、同人社並稱三大塾，之後亦曾在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及東京帝大古典科擔任教職。著作等身，門人甚多（竹林貫一1969：1346-1350）。

評者當中橋本武可能是四個人當中最重要的朋友，因此他還在書後寫了一篇跋，他提到他在台灣期間，對台灣的風土人情「欲記以備忘久矣！而毛錐子不從意，鐵目鉢心，未及成而已」，可見文人多有記錄奇風異俗的想法，關鍵只在於筆快不快而已。

另一評者是山田準，字士表，號濟齋，日本岡山縣人，生於1868年，卒於1952年。他是漢學者，也是三島毅的門下生，因此與作者佐倉孫三誼屬同門

。山田曾創王學會，講授王守仁《傳習錄》，是日本陽明學者（竹林貫一編1969：1918）。因此可以猜測本書〈土匪〉一則的「評曰」提到王陽明的話，應該是山田濟齋所寫。

本書於1903年出版之後，1904年福州的美華書局再印了《台風雜記》⁶，之後有三個版本在台灣復刻。1961年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重新標點，並增加百吉「弁言」，繪圖三禎及目錄，成為台灣文獻叢刊第107種出版。大概是1987年，大通書局將《臺風雜記》與《台遊日記》、《台灣遊記》、《台灣旅行記》四書合刊為一冊，列為台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九輯出版。1996年台灣省文獻會依據台銀版重新刊印，列為台灣歷史文獻叢刊出版。照理台灣學界知道有此書的人應該不少，但是年輕學者恐怕知曉它的，就不多。而其在台日文化接觸史上的意義，與日本殖民主義之關係的探討，我認為是很值得加以細究的。

二、日治時期第一本台灣風俗記錄

首先，《臺風雜記》是日本殖民台灣時期的第一本有關台灣風俗的記錄。日本統治台灣的五十年之間（1895-1945），有不少關於台灣的風俗記錄，其中由單一作者所寫的專書主要有六本，即1903年佐倉孫三的《臺風雜記》，1921年片岡巖的《台灣風俗誌》，1929年西岡英夫的《台灣の風俗》⁷，1930年山根勇藏的《台灣民族性百談》，1934年鈴木清一郎的《台灣舊慣冠婚葬祭と年中行事》，與1942年東方孝義的《台灣習俗》。以內容份量而言，片岡

6 日本友人西村一之提供之訊息。

7 本書曾收入《日本風俗史講座19號》，1928年出版。

殖民者對殖民地的風俗記錄——佐倉孫三所著《臺風雜記》之探討

巖的《台灣風俗誌》最是龐然大觀。但是以時間而言，佐倉孫三的《臺風雜記》是最早的一本，意義非凡。

這些戰前的風俗記錄其基本體例大致類同，都是一則一則的風俗的紀錄，《台風雜記》記錄了114則，每一則都有評語，《台灣風俗誌》記錄了一千多則，《台灣習俗》則記錄了212項358則。《臺風雜記》沒有分門別類，後二書則有分門別類。《台灣民俗風物雜記》⁸實際上是56篇隨筆，也沒有分篇。至於《台灣舊慣冠婚葬祭と年中行事》雖然有分編分項，實際上還是一堆細碎的條目所構成。無論如何，這五本書都是呈現了日本人有聞必錄百科全書式的知識類型。《台灣の風俗》看來編輯得比較妥善，因此沒有一大堆細目的問題，主要也是因作者的目的即在於簡明摘要「台灣人」（漢族）與「生蕃」（高砂族）的習俗，詳細的紀錄他說要期之於後日之故（西岡英夫1928：2）。

戰前這六本台灣風俗記錄之專書的作者當中，佐倉孫三會漢文，鈴木清一郎精通台語，兩人同樣服務警界。片岡巖則是法院通譯，東方孝義則曾任高等法院檢查局、文教局囑託（池田敏雄 1982：113）⁹。西岡英夫與山根勇藏則身份不詳。佐倉的《臺風雜記》雖然是綜說台灣風俗的第一本書，但可能是因為以漢文出版，之後出版相關書籍的作者似乎都未參考到他這本書，如鈴木在其書中序言說他參考了片岡巖的《台灣風俗誌》等書，卻未提及有參考《臺風雜記》。

佐倉孫三既是來台日本文官中最早接觸到台灣，而提筆記錄其風俗的，代表日本文化與台灣文化的第一次接觸（first encounter）。作者在前言中說，《臺風雜記》是「摘記…與我本土相異者一百餘事」，另外又可讓我們窺

8 這本書是日文原著《台灣民族性百談》的中文翻譯，1989年出版。

9 感謝植野弘子教授提供池田敏雄著文（1982）之相關訊息。

見兩個文化初遇時，作者如何以己文化（日本文化）來觀他文化（台灣文化）的態度。那麼他所記錄的台灣風俗代表清末的台灣舊俗，也就是還未受到日本殖民統治影響以前的台灣風俗本貌。現今的台灣文化已然受到日本統治所帶來的日本文化以及國民黨統治所帶來的大陸文化的雙重影響，1895年以前的台灣文化基本上是中國福建廣東來的移民適應斯土斯文所產生的偏向海洋島嶼色彩的文化，這個文化的真貌（authentic configuration），透過《臺風雜記》表露出來，雖然是代表日本知識份子眼光下的台灣風貌，但是和中國文官、學者透過方志的撰寫，所表現出來的台灣風貌卻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顯示在前者以異文化的觀點來敘述，而且呈現比較的意圖，後者則以中國文化中之邊陲的、化外的眼光來看待台灣。

《臺風雜記》最大的特色是戰前日本人書寫的台灣風俗記錄當中，它是唯一用漢文寫的。不僅作者佐倉孫三是精通漢文的高手，評者當中，應該也有精通漢文的。像「鹽田」一則的評者，說「余曾讀鹽鐵論」，連漢代的漢籍古典都能閱讀的人，今之華人恐也不多。通曉漢文可說是19世紀很多東亞知識份子的基礎素養。在所謂「漢字文化圈」的範圍內，如果我們能從「非漢地區」的漢文作品來作一些整理與分析，以此探討東亞地區的各個民族如何透過漢字來消化吸收漢文化的不同層面的內涵，把它整合到各個的文化中，或者藉著漢字來表達其文化的內涵，也不失為具有人類學意涵的研究。佐倉的《臺風雜記》便是透過漢字表達了諸多日本傳統文化的內涵，雖然是屬於第二層的表露，因其第一層所要表露的是台灣傳統的文化，不過也因為有與第一層表露互為參照的作用，其所具有的人類學比較的意涵就更為豐富。

三、殖民者文獻的解讀

《臺風雜記》的首頁一開始就說得很清楚，本書是作者「在台灣總督府民政局，公務之餘」所作，是「以供施政之資料」。因此本書很明顯是為了殖民的目的而書寫的，也因此總督府民政局長後藤新平替他作序，時間是在出版的當年二月。因此本書是不折不扣的「殖民者文獻」，不僅作者是殖民官，其寫作之目的也是為了殖民的目的。

上節列舉了許多日據時期的台灣風俗記錄，當然也可視為殖民者文獻，呈現殖民者對殖民地的心態，此由各個作者所自述的出版目的也可查知，如鈴木清一郎說其書是以「正確認識台灣及台灣人」為目的，若有正確的認識，對治理台灣以及經營各種事業都有所幫助，進而也可實現「中日親善」及打破迷信與改善民俗。可見對作者而言，正確認識台灣的目的，主要還是為統治的方便與目的。又如西岡英夫記錄台灣風俗，已把台灣的漢人、平埔族、高砂族視為「新附之民」，以此角度記錄其風俗。

如果我們仔細探討為什麼佐倉孫三要用漢文書寫有關台灣風俗的紀錄，若如他所言，是為作為施政之參考，那麼可以猜測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之初，在台實行殖民後統治的日本官員，懂得漢文的必定不少，否則《臺風雜記》便不會有參考的價值。但是可能作者除了寫給日本人看之外，應不無寫給台灣人看的意圖，用漢文寫不只顯示溝通的目的，也顯示他漢文的造詣，可以爭取台灣士人之向心力。

前面已經說過，這本書除了作者之外，還有後藤新平、三島中洲、橋本矯堂、細田劔堂、山田濟齋共同構作了這本書，因此讀《臺風雜記》可以認識到這些日本人的文采思想。其實就書的內容來說，作者還提及的日本人物尚有國醫佐藤（進）、橋本（綱常）、池田（謙齊）、松本（順）、青山、佐佐木（東洋）等人，他們都是日本初代學習西醫的高手，日本人所引以為傲

的，以及曾著作《棧雲峽雨日記》的儒學家竹添井井等人，也講到日本的富商藤田（傳三郎）與大宮（名字不詳），到台灣開採金礦，他們可說都是當時日本的秀異份子（elite）。反觀書中所提到的台灣人士只有寥寥幾位，一位是建築台灣鐵道的清朝官員劉銘傳，一位是打狗的富豪買辦陳某人，說他給錢不要收據，是台灣人信任別人的一個例子，另一位是清初養鴨造反的「鴨母王」朱一貴。

因為台灣初入日本的版圖，本書提供了許多日本殖民政府治台之初的一些具體的做法之資料，因為是在台灣的風俗記錄裡頭附帶講的，所以敘述簡略，不過也可窺知日本施政中與人民日常生活相關的一些具體措施。例如「學房」一則提到「今也我總督府設國語學校，大圖教育之進步」（P.18），說明治台之初急欲台灣人知曉日本語之一般。「不潔」一則講到「邦人來本島以來，大致力於街衢清潔法，或新築溝渠，或填敷砂礫，一望坦然，車馬晏如，且新穿井，清泉噴出，可以洗暑熱，可以濯衣裳，比之昔日街衢塵埃縱橫之狀，甚懸絕果何如」（P.28），說明日人來台之初，大肆清理街道，填平路面，鑿井取水，以便清潔。「火車」一則提到當年劉銘傳建的鐵路「途次抵獅嶺之嶮，進行甚艱，澁滯不動，即降車而推之，漸達嶺上。今也大起土木，穿隧道，揉迂曲，直前如箭，乘客滿溢，與昔時大異趣」（P.46），即是歌頌日本在台興建改善鐵道的功績。「醫生」一則提到「本島之入我版圖也，總督府先設醫院於各地，大施其術，起廢回死，不可勝數」（P.52），說明日本政府設醫院，推動西醫醫療設施的情況。「市場」一則提到「近時我警察有市場監督法，最注意於衛生風俗之事，秩然改面目云」（P.55），佐倉從事警務工作，最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日人一來台就監督市場，督導衛生，相當突顯日本人愛乾淨的形象。「大甲筵」一則提到「現時我總督府大獎勵其業云」（P.80），「樟腦」一則提到「現時總督府設置樟腦署，盛講究斯業」，可見振興產業，也是殖民政府刻不容緩的要政。「新高山」一則提到「

殖民者對殖民地的風俗記錄——佐倉孫三所著《臺風雜記》之探討

我皇帝陛下賜新高之號，蓋以新版圖中之高岳也」（P.101），從此台灣的最高峰玉山改名為新高山。

日本初取台灣，不免志得意滿，不過像佐倉這樣的知識份子至少謙卑一點，看到台灣豐富的產物，讚嘆之餘，也只敢說是上天所賜。例如「樟腦」一則的評曰說：「天授我以此膏腴之地，豈非祖宗之德乎哉」（p.83），「橄欖」（其實是文旦）一則之評曰：「我邦古來稱台島為高砂島者，蓋謂其珍寶甚富饒？」（p.84），「芭蕉實」一則講到台灣的香蕉好吃又能填腹，便說「非天賦之良，則何其如此乎」（p.78）。

從作者的眼光看來，台灣當然有一些不好的習俗，例如婦女纏足、吸鴉片煙，而且把這兩件事放在《臺風雜記》的一開始的頭二則來敘述，不知是否作者有意安排的「負面初印象」，也有一些作者認為應該要改善的習俗，如撿骨，或以迷信視之的習俗，如乩童。

當時日本確有文明開化之處，作者也會提到日本有何可供台灣學習之處，例如醫術、女子教育、消防設備，以及愛清潔的習慣等方面，都不無日本勝於台灣之敘述，也隱含台灣應加以學習之意。但是台灣被比下去的風俗行諸文字，讀起來也令人傷感。

四、比較民俗學的意涵

《臺風雜記》最特別的地方是它所呈現出來的比較民俗學的意涵。雖然本書是以台灣的風俗記錄為主，有時作者在正文中或評者在評曰中，也述及日本的風俗，在全書共一百十四則的條目中，其內容未涉及日本的幾乎很少，比較戰前其他有關台灣民俗之記錄的書籍，我們如果從日台文化之初會遇的角度來看，可以看到日本人眼中對台灣文化之稀奇、欣賞、讚嘆、疑惑、不解

與批判種種的情緒。這是《臺風雜記》很不一樣的地方，也是它最大特色所在。

書中除了一般的日本風俗之外，也涉及日本的地方風俗物產，例如：宇治的茶，東京的庭園，橫濱的烘茶場，高野、奈良、京都的寺廟，佐倉「山葵」（其實是大蒜），鹿兒島的芭蕉，青森與長岡的街道等等，台灣的讀者讀來頗富興味，不只因為台灣有關日本風俗的介紹其實很少，而且台日風俗對照的興味，更讓人低迴不已。

基本上《臺風雜記》這本書記錄台灣風俗的態度，是取其與日本相異者而記之，如作者的前言所說：「摘記台灣之人情習俗家庭產物等，與我本土相異者」，因此對於日台共有之習俗，會舉出其相異之處，例如描述台灣的歌妓，說她們如同日本的藝妓，吹笛、彈琴，體態搖曳，惹人憐愛，不同的是她們會與客人一起吃東西，而且會用手擦鼻涕。（P.34）又如，講到台灣的烏龍茶就說與宇治、峽山的茶「色味相異，而氣品相若」（P.34），說到台北大稻埕的茶房就說橫濱的烘茶場熱鬧紛雜，兩者相異太大（P.35）。又如，講到台灣的講古師就談到日本的「講釋師」、「軍談師」，並論其相異之處。再如，講到當時台灣人使用的錢包，就說與日本的「金囊」相似，只是掛在下腹部，行走時，銀元銅錢在裡面作響，很奇怪（P.95-96），等等，不勝枚舉。對於台灣獨有之習俗，則會舉出日本之類似的習俗，例如講到台灣婦女的纏足，就說到日本婦人的涅齒（P.2），又如講到台灣的「火籠」就說它形式像日本的「花籠」。

作者從異文化出發，反觀日本文化，其中不少作者反省性的一些思考，覺得台灣人哪裡好，日本也無妨多多學習，舉例來說，「婦女修飾」一則提到台灣婦人修飾面貌，遠超日東，不僅說台灣女人真幸福，日本女人多不幸，還說台灣男人真幸福，日本男人多不幸，儘管是玩笑話，可見作者也希望日本女人多學學台灣女人每天梳頭髮、擦面粉、戴首飾（P.31-32）。「飼鴨」

一則提到台灣人很會養雞養鴨養鵝，評曰就說「家禽之關於國益民福大矣，豈可不傲於台人之顰乎哉」（P.68-69），希望日本人也多學學。「農制」一則提到「台地農制規模（模）之大，遠勝於我」說台灣的農田一畝接一畝的，都很開闊，不像日本那樣狹隘錯雜」（P.88）。

從正文處處可見到日本人百科全書式，以經驗為主的民俗知識傾向，我自己覺得這是日本的知識系統和西洋的知識系統很不一樣的地方，生活化的知識，經驗性的知識，作細微的描述，發微的探究，雖然未必系統化、抽象化，但是有實用的價值，也容易引發一般人的共鳴，知識的共通性程度相當高。

五、二度被殖民者的想法

為了替我正在出版的《白話圖說臺風雜記—台日風俗一百年》作序，前輩民俗學者劉枝萬博士曾論及日本治台與國民政府治台之初的種種比較，記錄如下：（一）人才問題：日本最初派遣來台灣的大多是精英的秀異份子，雖然大多是以非主流的日本東北人士居多，但台灣反成展現其能力的出路。本書的作者佐倉孫三精通漢文，是有良心的知識份子，而且論台灣風俗不偏不倚，沒有征服者的優越感，日本不好的一面，亦客觀承認，殊屬難得；寫序的後藤新平更是治理台灣的一代功臣，後來規劃執行滿鐵之調查，是相當有識見的人物；而陳儀政府之來台人員，則良莠不齊，貪贓枉法。（二）法治問題：日本在大津事件之後，即以法治立國，台灣受日本統治，亦奠下法治基礎，而國民政府來台卻反其道而行破壞法治，而採人治。（三）give and take的問題：日本殖民之初是先下投資，也因對台投資太重，而引起中央政府

部分人士的不滿；而國民政府遷台之初，卻以戰勝國的姿態能拿的先拿，把台灣的米糧大量運往上海，這是戰後初期台灣物價波動甚巨，幣值一日數貶的重要原因。（四）文明與野蠻的問題：台灣受日本統治之初確實文明開化不如日本，因此雖不甘為異族統治，但也儘量學習日本好的地方；而光復之初，中國歷經戰亂，文明開化程度不如台灣，但台灣卻受其統治，痛苦與分歧，勢不可免。

劉枝萬先生身經戰前與戰後兩個政府的統治，以上四點是他有感而發，卻也不是憑空之言。他的說法代表具有二度被殖民之經驗那個世代的人的心聲。

我輩則是戰後出生的嬰兒潮世代，在國民黨的教育體制下成長的世代，國民黨的奶水裡其實還摻雜著美援的奶粉泡的牛奶，國民黨是不是外來政權，是台灣不同政治立場者想法歧異的所在，對我而言，蔣氏政權下的國民黨統治是一種「內部殖民」（internal colonialism）。無可諱言，1996年中華民國總統直接民選之後，這個內部殖民體制理論上應已不復存在，之後是台灣內部如何調整其政治制度與架構的問題，這一個「後殖民」處境發生迄今也不過短短的八年而已，一般人未必對此一後殖民處境有深刻的認識，因為對前一階段的被殖民狀態在意識上可能很多人也是沒有的。在後殖民階段如何看待評估前一個階段的殖民統治，以及前前一個殖民統治，確實是台灣人需要面對的歷史認識的大工程。

既然已經處於不再被殖民的狀態中，就應該努力去除被殖民的悲情，被日本統治的悲情，已經距離遙遠，被蔣氏政權高壓威權統治的悲情對當今許多的台灣人卻仍然很難過去，但是也要努力讓它過去。蔣氏宣稱其是代表中國的合法政權，這樣的政權已經過去，我們自然毋需以這一個政權的眼光來檢測日本殖民台灣的功過與意義。何況在蔣經國的晚年，他也宣稱自己是新台灣人，如何以現今台灣人的眼光來面對過去被殖民的歷史，來正視當今的後

殖民處境，來展望未來的新國家的新藍圖，我想是具有歷史意識的改革者需要認真面對的問題。

拋棄悲情之外，我覺得一個更積極的態度應該是，既然曾被殖民已是一個不可改變的歷史事實，何不從被殖民的經驗中思索有何我們可以學習之處，不只是直接從殖民者去學習，更重要的是從自身的經驗中去學習，或者正面的去看殖民者既已從我們取得、剝奪了一些東西（生命、財產、智慧、尊嚴），而他們到底留下些什麼有用的東西給我們，不是說他們好意或有意留下些什麼好東西，而是我們的眼光能否看到一些好東西。我想，如果我們如是尋求，便必如是尋著。對日本殖民統治如此，對戰後蔣氏政權的統治也是如此。如果我們都看殖民統治壞的一面，眼裡只有壞的，作用於我們心裡也只有壞的，這絕不是我們所要的，這只能讓我們在後殖民的情境中一直飽受被殖民的陰影，而無出脫可言。

因此我把《臺風雜記》這本一百年前日本人寫的書，重新加以編排，譯成白話，對今人難解之處加以註解，並找出日本與台灣風俗的老照片加以對照，且增添「譯者的話」擇要敘說當今台灣風俗的變化，編成《白話圖說臺風雜記》一書，預定2004年4月出版。白話翻譯此書不在發揚日本人的優越意識，而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昔時日本勝我，今日我又如何？當年勝人，今日我又如何？比較不是目的，而是一種視野。希望本國讀者不斷惕勵，台灣文化不斷精進。

我的最主要目的是想藉著一百年前日本人的眼光，重新來省視台灣風俗及其變化，儘管佐倉孫三是一個代表殖民政權的殖民官，但他同時也是一個有良心的知識份子，他所著作的《台風雜記》，已然成為記錄台灣風俗的重要文獻，它也刺激我們對日本傳統文化之理解之興味，兩個文化之間的互相參照永遠是互相了解的開端，密契的程度也有賴對方共同的努力。

～參考書目～

- ◎ 山根勇藏
1989 台灣民俗風物雜記 台北：武陵出版社
- ◎ 日本合同通信社編
1932 台灣大觀 台北：成文（1985年復刻，中國方志叢書，台灣省，163號）
- ◎ 片岡巖
1994（1921） 台灣風俗誌 台北：南天出版社（台北二刷版）
- ◎ 平島郡三郎
1995 二本松寺院物語 東京：歷史圖書社
- ◎ 西岡英夫
1928 台灣的風俗 長坂金雄編《日本風俗史講座19號》頁1-64 東京：雄山閣
- ◎ 竹林貫一編
1918（1969） 漢學者傳記集成 東京：圖書院
- ◎ 池田敏雄
1982 殖民地下臺灣の民俗雜誌 臺灣近現代史研究4：109-151
- ◎ 佐倉孫三
1903 臺風雜記 東京：國光社
- ◎ 東方孝義
1974(1942) 台灣習俗 台北：古亭書屋
- ◎ 林美容（編譯），佐倉孫三（原著）
2004 白話圖說台風雜記 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出版中）
- ◎ 鈴木清一郎（著），馮作民譯
1984再版（1989增訂版） 台灣舊慣習俗信仰 台北：眾文圖書公司

